

社会学名家讲坛

包智明 主编

- | | |
|-----|----------------------|
| 宝力格 | 一个世界性的友邻共同体正在形成 |
| 陈立行 |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社会系统的机制分析 |
| 费 伊 | 遗产化与政治化 |
| 张小军 | 在人类发展的视野中理解“民族” |
| 徐 平 | 大瑶山调查与费孝通的学术遗产 |
| 余埃特 | 当代社会中的少数族裔 |
| 尹邻镇 | 东北亚地区移民融合与多元文化主义 |
| 彭兆荣 | 民族志范式中“自我的他性” |
| 丁元竹 | 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深化改革 |
| 赵旭东 | 从乡土社会到枝杈社会 |

社會學名家讲坛

第四辑

包智明 主编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名家讲坛. 第4辑/包智明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161-7604-7

I. ①社… II. ①包… III. ①社会学—文集
IV. ①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5307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18千字
定 价 5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社会学名家讲坛》是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系列讲座之一。该系列讲座始于五年前。2010年，为纪念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央民族大学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举办了名为《社会学名家讲坛》的纪念讲座。从2010年的3月至6月，我们邀请到十位国内外著名的社会学家来中央民族大学做学术讲座，这既是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也希望我校广大师生可以借机领略社会学名家的风采并分享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纪念讲座开始之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场场爆满，大受本校师生欢迎，而且来听讲座的还有不少从外校甚至从外地慕名而来的学子。一场讲座刚结束，就有很多人开始打听下一场讲座的时间。可以说，我们举办的这个纪念讲座获得了圆满成功。

十场纪念讲座结束之后，很多老师和学生来找我，希望能继续听到名家的讲座。为了满足广大师生的要求，我们决定把《社会学名家讲坛》的讲座继续办下去。这样，原本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举办的纪念讲座，就变成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常规性系列讲座。几年下来，我们发现，《社会学名家讲坛》系列讲座的效果明显，不但使听讲座的师生开阔了学术视野，而且也极大地提升了社会学学科的认知度。不仅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坚定了学习和研究社会学的信念，还有不少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受讲座感染，决定报考社

会学专业研究生或要求转专业到社会学专业学习，社会学成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个热门专业。

中央民族大学的社会学专业还很年轻，但自 2001 年建立以来，发展迅猛，引人瞩目。这离不开包括《社会学名家讲坛》各位主讲人在内的社会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也获益于老一代社会学家立下的深厚学术根基。众所周知，社会学曾经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优势学科。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央民族学院借高等教育调整之机，汇集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全国一流人才，其中包括吴文藻、潘光旦、吴泽霖、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陈永龄、宋蜀华等国际级大师，完成了中国民族识别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调查等大型研究，为今天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学科发展奠定了综合多学科涵养、关注民族地区现实社会问题的学术传统。20 世纪 70 年代末，社会学在中国重建之时，中央民族大学虽没有建立社会学专业，但老一代社会学家依然进行了社会学、人类学，尤其是民族社会学等相关内容的教学和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并在社会学恢复阶段的人才培养和学科体系建设工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植根于老一代社会学家培育的学术沃土，又有学界同仁的关爱支持，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学科才能在成长道路上不断迈出坚实的步伐，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中央民族大学于 2001 年开始招收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2003 年开始招收民族社会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2006 年获得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2011 年获得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2012 年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在中国本科专业排名中进入前六名，社会学一级学科评估进入前十名；2014 年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一级学科被评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同年获批设立社会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央民族大学的社会学学科有其研究方向的特色，即把社会学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应用到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之中，为解

决中国民族问题、做好国家民族工作献计献策。进入 21 世纪后，国内面临改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建设和谐民族大家庭等议题。在国际和地区关系中，民族因素的影响作用也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中央民族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团队将从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步伐的有利时机，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及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大局，充分发挥民族学科的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学科的特色与综合实力，构筑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基地，争取迈入国内乃至国际相关学科领域的先进行列。

如果说中央民族大学的社会学学科在研究方向上要体现自己的特色，那么在教学方面，我们更注重体现社会学学科的共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课程设置尤其力求与国内主流大学相同并与国际接轨。因此，主要面向社会学专业学生且与其教学相结合的《社会学名家讲坛》系列讲座，其主讲人不局限于从事民族研究的社会学家，演讲内容也涵盖了社会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也包括归属社会学一级学科的人类学、人口学和民俗学的研究领域。

应邀在《社会学名家讲坛》做讲座的主讲人都是国内外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能够第一时间在现场聆听这些名师专家最新研究成果的人是幸运的。我们希望没有条件在现场听讲座的学子也能够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此，我们在征得各位主讲人的同意之后，决定把讲座录音整理成文字编辑出版。作为系列丛书，我们将按照系列讲座的先后顺序每十讲编辑成一辑陆续出版。收录于第四辑的即为系列讲座的第 31 讲至第 40 讲。《社会学名家讲坛》系列讲座的先后顺序完全是根据主讲人的时间方便来确定的，与其知名度和学术地位无关。

在这本《社会学名家讲坛》第四辑付梓之际，我向收录于第四辑的系列讲座的各位主讲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同时我要感谢担任系列讲座的主持、评议、现场翻译、录音整理、编辑、校对等工作

的中央民族大学师生，尤其特别感谢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同事袁剑博士和王晴锋博士为《社会学名家讲坛》系列丛书的出版所做的一切。最后，我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责任校对，他们的辛勤劳动保证了这本书的出版质量。

包智明

2015年11月8日

目 录

(按讲座时间先后排序)

- 第一讲 一个世界性的友邻共同体正在形成:蒙古国
“第三邻国”外交政策的艺术 乌·额·宝力格(1)
- 第二讲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社会系统的
机制分析 陈立行(22)
- 第三讲 遗产化与政治化:塞内加尔谢列尔族“豪伊”巫师和
占卜仪式的历史变迁 西尔万·朗德里·费伊(45)
- 第四讲 在人类发展的视野中理解“民族” 张小军(62)
- 第五讲 大瑶山调查与费孝通的学术遗产
——社会人类学何以改变社会? 徐平(89)
- 第六讲 当代社会中的少数族裔:民族国家与社会科学的
新挑战 阿梅尔·余埃特(126)
- 第七讲 东北亚地区移民融合与多元文化主义:
现状及测量新方法 尹邻镇(145)
- 第八讲 民族志范式中“自我的他性” 彭兆荣(157)
- 第九讲 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深化改革? 丁元竹(178)
- 第十讲 从乡土社会到枝杈社会
——文化转型的中国处境 赵旭东(201)

第一讲

一个世界性的友邻共同体正在形成： 蒙古国“第三邻国”外交政策的艺术*

乌·额·宝力格 (Uradyn E. Bulag)

一 蒙古国“第三邻国”政策介绍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世界格局发生巨变。如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蒙古国也被卷入其中。当时，蒙古国内正值民主运动势头高涨，并引发了反苏联殖民统治的自由运动。这场新兴的民族运动控诉了苏联对蒙古国的剥削与殖民，同时谴责了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对蒙古国的大清洗，据称当时死亡人数达十万之多。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的缓和，苏联陆续从蒙古国撤军，后于 1991 年解体。这样一来，蒙古国与其说是失去了一个传统的保护者，不如说是赶走了自己的保护者，但一个新兴的蒙古国却开始独自面对其一直以来的敌对国家——中国。

纵观整个 20 世纪，可以说蒙古国与中国的纠纷一直持续不断。1911 年 12 月 29 日，蒙古国宣布脱离清朝独立，1915 年又失去独立

* 主讲人为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授；主持人为包智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该讲座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20 日下午 3：00—5：00。该讲座为系列讲座第三十一讲，由陶染春录音整理。

地位变为中华民国的自治邦，1946年蒙古又重新独立，中华民国正式承认其为独立自主的国家，1949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友好关系仅维持了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随着中苏冷战的到来，中蒙又开始处于敌对状态并逐步升级。1966年，苏联开始在蒙古驻兵，中国也开始在中蒙、中苏边界陈兵百万。这一时期，中苏两个国家都对自己国内的敌对分子进行大清洗，蒙古国也对境内的中国华侨进行驱逐。由于长期的政治宣传和教育，以及内蒙古的现状，蒙古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感逐渐加强，再加上1989年中国国内一些政治事件的爆发，他们感到深深的自危。

1989年，中蒙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内蒙古人开始不断涌入蒙古国。但他们当中很多人说汉语，即使有些说蒙古语也夹杂着汉语词汇，所使用的方言也与当时的蒙古国内的方言存在差异，还有一些人的行为举止和认知都受到汉人的影响。这些内蒙古人就像一面镜子，向蒙古展示着中国文化影响的后果。所有这些都增加了蒙古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和不安感。当时还有一些俄罗斯极右民族主义分子，像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他们甚至口出狂言要把蒙古卖给中国，以此获得外汇并激活俄国经济。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经济崩溃都促使蒙古国迅速改变其外交政策，可以说这个外交政策转向关乎蒙古国的生死存亡，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1990年6月，就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修改宪法，使得反对党地位合法化并确定多党选举制一个月之后，美国派出了第一任常驻蒙古大使，尽管两国已于1987年建交。1990年8月2日，蒙古国大选后不到一个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其进行访问，并在国会演讲时明确表示支持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据说，他告诉蒙古人：“蒙古有两个友好邻国：中国和苏联，但如果需要第三个邻居，美国愿为其效劳。”随后，美国率先支持蒙古国的过渡，并率领九个民主国家为其提供经济援助。

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的睦邻政策旨在取代即将要解体的苏联，

帮助蒙古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所带来的影响。然而如蒙古的一位战略家穆克沃·多吉德（Munkh - Ochir Dorjjugder）所提出的：“作为支持蒙古国民主进程的姿态，美国的睦邻提议对蒙古的利益远大于对美国自身的利益，这一提议可能在华盛顿很快就被遗忘，但蒙古国的精英分子会对此念念不忘。”虽然蒙古人受到这一提议的启发，并积极在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寻找第三邻国，但美国现任蒙古协会主席阿莉西娅·坎皮（Alicia Campi）承认，其实美国一开始就没有兑现自己承诺的意思。蒙古官员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前任外交部长额尔德尼·楚伦（L. Erdenechuluun）曾经写道：“对于蒙古国很多政要来说，美国是新蒙古的救星，也是其国家安全的主要支柱。但是美国官员刚开始并没有把‘第三邻国’这一概念放在眼里，他们只是将蒙古视为夹在其重要的两个对手——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一个友好而势单力薄的国家。”

美国的这一态度让蒙古国意识到非地域趋利的需求，第三邻国并不能制衡中国或者俄罗斯对蒙古的影响甚至威胁。于是，在1994年提出的蒙古国家安全理念中，他们改变了其传统依靠朋友对付敌人的“硬性平衡的办法”，宣布蒙古外交政策将基于更为现实的国家利益，不结盟，积极参加国际事务，以此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强增进国家发展的国际合作环境。蒙古国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将自己定位为小国，并开始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平等的邻国，不再把其中任何一方当做朋友或者敌人，希望在改善外交关系的同时，与这两个国家保持同等的距离。如此一来，蒙古的后社会主义外交政策试图恢复到20世纪30年代布里亚特蒙古学者扎木察拉诺·策本（Tseveen Jamtsarano）所倡导的构建中立国家的理念。这一理念在1992年9月25日这一天最明确地体现出来，蒙古国总统彭·奥其尔巴特（P. Ochirbat）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宣告蒙古国为“非核武器地域”，同时庄严承诺蒙古不会倒向邻国任何一方，或者是允许任何一个邻国或其他国家利用蒙古的国土对蒙古的邻国造成威胁。

经过近十年的积极实践，蒙古国正式把“第三邻国”政策写进其在2010年6月修改的蒙古国家安全理念当中。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邻国”这个概念成为其定位自身在世界上位置的核心概念。很多国家都有睦邻、邻国的概念，但其不是外交政策的核心，而蒙古国则把邻国作为外交政策最核心的概念。在这一新的外交政策中，蒙古的国家主权基于将中、俄两国视为同等距离的邻国，但更重要的是基于与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友好的非民主国家组建而成的第三邻国，这其中最重要的成员包括美国、欧盟、日本等。这些第三邻国共享一大特点，即与蒙古国没有土地或者海洋的接壤。把没有领土与海洋接壤的国家当做邻国，我认为这是蒙古国的一个创举。

上文试图阐明蒙古国的“第三邻国”外交政策的缘由。该政策主要出于防御目的，利用第三邻居来制衡周边接壤邻国的任何侵略行为。然而，蒙古国宣布自己是中立国家，奉行不结盟政策，又如何不被“第三邻国”所利用，要求其发挥自身“软实力”以对抗中国或者俄罗斯？可以说，这一外交艺术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政治行为中避免过于政治化。

二 幸运的邻国和不幸的邻国

邻居是基督教道德哲学中的关键隐喻，最近被启用于设想一个国际性的世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要把身边的移民、陌生人和其他非本地人统统视为我们有义务去爱戴的邻居。邻居这个概念的核心吸引力在于它的短距离性，用亲近、短距离来克服敌对。这样一来，近邻不仅是目的，同时也是手段，因为邻居这一概念可以为政治服务。比如，美国于20世纪30年代出台的“睦邻”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是从战略角度出发的，目的是促进不干预政策 and 与其南边的邻国达成友谊，并因此获得了拉丁美洲的支持，用来对

抗德国迫在眉睫的威胁。

受美国模式的启发,中国自1950年以来也采取了与之类似的睦邻友好政策,这一政策根植于中国传统的邻居观念中,有“唇齿相依”之意,强调邻里之间共同的利益。在2003年,中国扩展了睦邻政策的范围,在宣称“和平崛起”的同时,承诺促进“友好、和平、繁荣”的邻国关系。基于睦邻政策还衍生出两个额外的维度,即安邻和富邻,这无疑是中国出于安抚邻国,提高自身威信而做出的考量。

我认为,友好邻居这个伦理概念其实是一种定居的形而上学,正如智者所说的:“你可以选择朋友,但不能选择邻居。”但就像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说的,麻烦在于敌对、仇杀往往发生在近邻之间。在波斯尼亚,邻里被称为“koms'uluk”,这是一个矛盾的概念。一方面,从文化角度把“邻里”预期为一种亲密的社会性,近邻应该相互往来;另一方面,同一社区存在不同种族之间的界限,邻里之间仍旧无法避免互相仇杀的紧张关系。有人可能争辩道,亲近并不必然导致友谊;相反,正是由于相互重叠的利益,维护邻里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变得困难,但确实有存在的必要。贾可-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曾经敏锐地写道,“当邻居远的时候,爱他很简单,当过于亲近的时候,则另当别论”。

邻居还含有地缘政治的概念,这很可能是国际关系的特征之一。戴纳·卡夫(Dana Cuff)在描写美国郊区邻里图示的时候指出,邻居具有空间性和社会性。她说,从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观点来看,邻居还具有政治性,这种政治性体现在我们需要在好邻居与坏邻居之间做出智慧的区分。选择与正确、友好的邻居交往、相处,是我们生存下去以及安居乐业的首要保障。如上所述,蒙古用第三盟国外交策略来平衡与中、俄之间的关系,避免发生冲突,这也反映出邻居具有双重性,既是政治的也是反政治的。可以说,邻居是矛盾的起源,也是解决的办法。

从游牧的视野看待问题，可以让我们摆脱邻居的伦理道义和地域的约束。下面我将要分析，蒙古的“第三邻国”概念如何显示出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不仅需要一种伦理的诉求，更需要一种选择邻里的自由，从而可以聚集、重组一个新的邻里社区。从某种程度上说，蒙古国积极邀请新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成为其“第三邻国”以对抗中、俄两个接壤国家。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地缘政治的重新组合，使得蒙古由夹在中俄之间的闭塞内陆国家华丽转变为新型的世界共同体的中心，这是蒙古国自身外交努力的结果。

蒙古的这一做法可以由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提出的翻译社会学理论给予最佳的诠释，他认为社会集团的形成是翻译社会学解释的对象，反之，在社会的社会学里面，社会集团已经形成，它是出发点而不需要再进行解释。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做出解释的是蒙古国如何试图聚集，形成新的、大范围的邻里关系，并进而分析蒙古是否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世界政体以及它的特点。

拉图尔的翻译社会学认为，社会集团不仅仅是由人组成的，其中也包括非人的因素，非人（物）也有主观能动性并发挥作用。我认为这点对于理解蒙古国新邻里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但并不是所有的人或物都具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能够发挥同等的作用。我们要看到环境、历史和文化对每个社区和邻居关系的形成、形成时间的长短、产生的意义都有一定的影响。

意大利学者 Giovanni da Col 最近（2012）发表了一篇有意义的文章，主题是关于“世界观经济”（cosmo-economics），他认为西藏的文化和生活围绕着“央”（yang）这个概念，“央”在藏语里是“运气”的意思，管理自身的运气是幸运生活的基本形式。运气是个体与群体的关键，但是运气需要分享：“好运必须要分享与再分配，用分享、分配的经济手段建立一个社会网络。但是运气需要精心经营，否则难免会引来一些免费搭车者和寄生虫。”换句话说，太多的运气和福禄就像一锅肉，放置不好就会引来很多苍蝇，经营不善也

可以引来不幸。我使用这个观念意在指出，运气与福禄的分享或者不分享会导致社会团体的重组和新社团的形成。

Da Col 所指的运气是看不见的东西，无可量化，但可以具有一定关系化的物质性，也就是说，运气是可以保存的，放在某个地方并可以获取，但若经营不善或者外界过度需求，运气也是可以逃跑、失去的。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运气概念的广泛性和非具体性，而我关注的是具体的地域所拥有的福禄、运气，运用得当可以使当地人更加繁荣昌盛，反之亦然，因为这种关系化的物质性很可能会受到外界的觊觎。我由此提出“当地人的主权运气”这个概念，它可以理解为特定地区的物品或者叫做方物。在中国的世界观中，方物具有世界观经济性（cosmoeconomics）与政治性（cosmopolitics）双重性质。举例来说，从中国传统的天下论来理解方物的双重性质。天下图式是通过中心与边缘的层级距离来衡量文明的程度的，与之匹配的朝贡制度其实是表达了政治的权威和经济的福禄，也就是说，中心的权威性必须要由边缘提供的供物来支撑，朝贡的方物不只是一种象征性，它还代表了一种当地的主权运气。朝贡之后作为回报，边缘领袖往往得到更多的礼物，这些馈赠又恰恰是皇帝所控制地域的方物，但政治上边缘地区仍旧服从于中央最高权威，皇帝在政治上进行交换，进行分封，把边缘纳入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之内。这种物质上的交流不仅是一种经济交流，还有一种世界、天下的相互建构，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交流的物品也不是一般的東西，它必须是双方的地域方物，通过政治互动从而建立上下级关系。

在这里我试图提出另一个观点，即天下朝贡制度必须建立在中原物质丰盛的基础之上，而中原赖以生存的物质是不能够自己独享的，它必须要与边缘分享，必须要与非汉人来分享，通过分享来再次重组或者建构新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形式。没有这种福禄，带有物质性的运气和主权，就不可能有相互性的政治交往。然而，这种分享更不可能随意进行，它在进行当中实际上存在一定的风险，

因为边缘人经常不满足于现有的关系，他们很可能羡慕中原物质的丰盛，而要去征服与占领，我们发现中国的历史往往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一方面，中原的天下论强调中原向心力，中心的伟大必须要建立在边缘对它的朝贡和支撑当中，为此对“远人”必须进行怀柔 and 教化；另一方面，当边缘对中心过于喜爱，过于频繁朝贡的时候，他们被认为是贪婪的，中原人很可能不再欢迎他们，建立各种防御机制去阻止他们进入中原。这里我的意思是，中国的主权运气——物质上的丰盛，是它伟大的基础，同时也会潜在地变成它不幸的源头。因此，管理好自己的运气主权是中国世界观政治的最基本形式。

上述地缘经济和世界观经济的研究角度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蒙古从一个外向征服者变成一个内向的、自我保护的群体。我认为，这种转变使得中国成为蒙古国危险的邻居，同时使得蒙古国自身失去作为中国邻居的资格。换句话说，我认为邻居不是偶然地域的连接，其实它们之间还有权利关系，邻居要与别人分享主权运气，因此，只有强者才能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本身是弱者便已经失去作为强者邻居的资本。

那么蒙古国的主权运气是什么？我认为，清朝将蒙古与汉地以长城作为界线进行分割，蒙古民族主义可以说是满清分而治之的结果，这种统治和管理方式使得蒙古有了清晰的边界概念，并加以防卫，同时，蒙古人开始发展出一种意识，即认为自己的大草原十分富饶。比如，到了19世纪末期，这里出现了很多地名含有“富饶、富庶”的意思，比如巴音郭楞、巴彦浩特、巴彦查干等。这一时期，蒙古人和藏人一样也开始讲求运气和福禄，他们认为这些都储藏在草原的山水当中，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非常满足，并具有幸福感。这无疑是清政府对蒙古分而治之的结果。当时，旗与旗之间相互不能越界，各旗内的蒙古人不会去羡慕对方，札萨克官员被要求定期祭拜旗界里的山水，以此来祈求它们赐予福禄，这些山水也变成蒙古人财富的提供者。这种世界观经济的转变，对蒙古世界观

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19 世纪末期，蒙古产生了很多关于金马或金牛的传说。比如，风和日丽时，大草原上有很多金马驹在奔腾、吃草，但有外人来时它们就逃跑，也就是说它们有自己的能动性，可以自己加以判断。还有些故事是讲金牛、金马在湖底畅游，这时会有“毛子”和“南蛮子”用各种手段骗金马、金牛上岸。这些主要是说汉人和俄罗斯人向内蒙古和外蒙地区移民，以及他们对土地的占领，同时也反映出蒙古人对自己财富进行保护的愿望。这些传说一方面较为讽刺地反映出富饶的自然资源是蒙古人财富流失与不幸的源头，另一方面也说明汉人从原来蒙古人入侵中原的受害者转变成蒙古资源的侵略者。

是否或者说如何与非蒙古人分享自己的主权运气，成为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事关蒙古国生存的重大问题。我认为 20 世纪初，蒙古的独立必须放在新的世界观经济、世界观政治当中去理解。这些又给蒙古一种机会结构，让蒙古发挥主观能动的机会，从而建立自己全新的国家。这里所提到的“机会结构”，就是指被蒙古的新资源吸引的诸多周边国家势力，他们都想把蒙古纳入自己的体系当中去独占、独享，同时，他们之间也相互牵扯与制约。我曾试图构建一个新的概念“协作式民族主义”（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去理解和掌握蒙古民族主义的特点和动态。一般来说，民族主义是为了独立，而蒙古的民族主义致力于建立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愿望并不是自己独立进行的，它往往是通过引入第三方，并与其建立统一战线来对付同样的敌手。这种关系的三角化意味着蒙古人必须具有主观能动性，去判断并决定如何用自己的运气、资源和财富，以此切断或者建立新的关系。我所提出的“协作式民族主义”观点是想说明民族主义并不是独自奋斗，而是与所谓的朋友建立联盟来对付所谓的敌人，并且这里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消灭敌人之后，与朋友分享战斗的果实。这里存在着一个三角关系：自己是弱者，与强者结合起来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敌人被打败以后剩下